

南开大学出版社

文学



文章学

主编 蔺美璧

副主编 徐江 李振起

编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占先 张乃鉴 吴志刚

李振起 徐江 蒋浩成

鲁日照 蔺美璧

南开大学出版社

文 章 学

蔺羨璧 主编 徐 江 李振起 副主编

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8.5

字数: 212千 印数: 1—22,520

统一书号: 9301·12 定价: 1.6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资	14
第一节 资于文字之中	14
第二节 资于文字之外	20
第三节 资于识见之高	26
第二章 文意	31
第一节 文以意为主	31
第二节 意在笔先	35
第三节 工于炼意	38
第三章 文情	47
第一节 文生于情	47
第二节 文须生情	51
第三节 文情表现	55
第四章 文序	69
第一节 文序说	69
第二节 文序的美学原则	75
第三节 文序的安排	80
第五章 文境	95
第一节 境界深邃的艺术创造	95
第二节 诗境与文境的差异	102
第三节 创造优美的文境	108
第六章 文色	117

第一节	文章有色 方能夺目	117
第二节	绚烂与平淡	121
第三节	饰色之要	125
第四节	让语汇仓库更丰满	132
第七章	文声	137
第一节	循声而得情	137
第二节	声感的构成	142
第三节	巧于和声	147
第八章	文势	155
第一节	文章的风格受气势制约	155
第二节	题材影响文章的气势	159
第三节	结构影响文章的气势	164
第四节	语言是显示气势的因素	169
第九章	文术	176
第一节	研究文术的意义	176
第二节	文术的选择	179
第三节	文术举隅	183
第十章	文品	196
第一节	文品的形成	196
第二节	文品的分类	206
第三节	文品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213
第十一章	文体	219
第一节	叙事性文体	219
第二节	抒情性文体	225
第三节	议论性文体	231
第四节	应用性文体	239
第十二章	文病	243
第一节	文病示例	243

第二节	文不厌改·····	251
第三节	改文有法·····	258
后记	·····	265

绪 论

文章学是研究前人写作经验指导文章写作的学问。作为一种理论，它来自写作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从春秋战国时代起，随着文章写作的勃兴、发展，探讨文章写作的论著也在前进。孔子、墨子、荀子、韩非的有关论说，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陈騄的《文则》，李涂的《文章精义》，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刘熙载的《艺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文章讲话》等等，都对文章学有所建树。

从上述论著看，对文章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典论·论文》把诗赋和奏议、书论、铭诔等通称之为文章。《文心雕龙》和《典论·论文》持同样观点。《文章精义》把诗和寓言称作文章。明清评点家把《水浒》、《金瓶梅》称作文章。随着时代的推移，历史的演变，文章写作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各门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对文章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五·四”以来，文章家们倾向于把文章局限在散文、报告文学、论说文、应用文等一般文章的范围。三十年代夏丏尊和叶圣陶的《文章讲话》就着重讲述一般文章的写法，但在具体论述中也还关照了诗和小说的写作。本书意在着重探索散文、报告文学、论说文等的写作规律，但为了说明问题，必要时也还要关照诗和小说的写作。

任何规律只能给人们提供相应的理论知识，却不能代替人们的具体实践。文章学也是这样。常言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前人总结出的有关文章的写作规律，对掌握它、运用它的人来说是外因，而这种外因要想对“这一个”、“那一个”的具体写作实践起指导作用，则还需通过“这一个”、“那一个”的主观能动性来加以实现、完成。因此，对如何调动内因在写作过程中的积极性，就特别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千古文章 为时而作

写好文章，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只有认识正确，才能自觉追求；只有自觉追求，才能知难而进，练就一手写文章的本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出现了许许多多写文章的高手，他们的写作实践和理论指导，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把写文章当作一种事业来看待，就是其中最宝贵的一条。早在鲁人所撰的《论语》中孔子就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兴、观、群、怨，就揭示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审美功能。东汉末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又进一步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治国的高度，实是对文章身价的最高赞誉。唐代杜甫也提出了与曹丕颇为近似的主张，认为文章是传之千古的事业。白居易则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韩愈是把写文章与“传道”联系起来，曹雪芹写《红楼梦》，也是为了“编述一集，以告天下”。总之，有出息的文章家“舞文弄墨”，都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或沽名钓誉，都是“为时而作”并要传之后人的。

正因为古人如此看重文章的价值，所以他们就能给我们创造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学史。从而，以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唐宋散文、元曲、明清小说，在世界文明史上树立起一座引人翘首的纪念碑。

但在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由于时代不同，阶级利益不同，因而“经国”和“千古事”的内容也便很不相同。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也是功利主义，不过那是封建阶级的功利主义。历史赋予我们以新的任务，我们讲究的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早在二十年代，鲁迅就倡导为人生的革命文学。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又提倡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学。跨入历史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又提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文章由经封建之国到经社会主义之大业，这是伟大的飞跃。正是由于我们的文章写作紧密地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了起来，因而就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反映民主革命的现代文学史，创造了迄今为止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文学史，尤其是跨入了历史的新时期，各种文章和小说、诗歌、戏剧争鲜斗艳，文坛呈现出开国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局面。

攀登无止境，更上一层楼。为了迎接文化建设的黄金时代，胡耀邦同志提出“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同志又代表党中央提出“创作自由”。“创作自由”，一切文章的写作，都应该是自由的。因此，为了使文章更好地起到“经国”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端正写作态度，钻研写作技巧，在深入改革的实际生活中，提高写作能力，振兴写作学科。

为时之作，是作者直面现实、拥抱生活的艺术结晶。高尔基的《母亲》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特别有启迪意义。由于他目睹了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深入体察了俄国工人的生活，因而，小说就能正确反映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俄国工人在其政党的领导下，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革命战斗历程。所以列宁就高度赞扬说，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许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

的益处。”^①写小说是这样，写其它文章也是这样。当代著名作家刘白羽由写散文转向写报告文学，也是拥抱生活，直面现实的结果。他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的散文变成了报告文学。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中国人民需要更直接命中敌人的投枪，更直接激发民族精神的战鼓。回顾畴昔，我一点也不因为我把许多生命花在写报告文学上而后悔，不论在这方面我做的多么微不足道，还是以无愧地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自慰。”^②他的报告文学集《为祖国而战》，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平津等地的伟大进军，激励着人们为解放全中国而英勇奋斗。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③、郭沫若的《读了〈李家庄的变迁〉》^④、茅盾的《谈〈李家庄的变迁〉》^⑤是四十年代中期适应新文学发展的三篇为时之作的文学评论。周扬赞扬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郭沫若赞扬“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也就象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株大树子。”茅盾赞扬《李家庄的变迁》“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赵树理的创作具体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周扬、郭沫若、茅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年后，热情赞扬和肯定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和艺术成就，显然是为适应进一步贯彻《讲话》的精神，繁荣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而作的。由此可见，所谓为时之作，就是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反映时代的呼声，歌颂人民的创造力，鼓舞人民奋发图强的斗志。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写喜剧，也可以写悲剧；可

① 高尔基：《回忆录选》第6页

② 刘白羽：《新版〈红玛瑙集〉序》，文化艺术出版社

③④⑤ 均是《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以选“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嶽上摩天”式的庄严雄伟的题材，也可以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式的轻松愉快的题材。鲁迅的杂文固然好，朱自清的散文同样惹人喜爱。巍巍的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散文固然催人奋进，杨朔的描写多娇江山的散文，同样引人入胜。方纪的《挥手之间》固然激动人心，吴伯萧的《菜园小纪》同样耐人寻味。题材无禁区，关键在立意。

因此我们写文章，一定要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和特定时代潮流同步的党的中心任务和重大政策影响下人们精神状态的变化上。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脱离党的重大政策，又不能简单地图解某些具体政策。这样才能避免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写中心，画中心”的失误。

二、勇于攀登 实事求是

有勇气才能攀登高峰，能实事求是才能找到真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遵循这条规律，写文章当然也不能例外。要攀登写作的高峰，就必须具有文章家的勇气、洞察力、预见性和政治敏感，这样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写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文章。徐迟写《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写《人妖之间》，就表现了他们的胆略和政治敏感性。

《哥德巴赫猜想》写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时，两个“凡是”还颇为盛行，文章写的是一位被称为“白专”的陈景润，并且还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涉及。在这种情况下，徐迟听到的是：搞这个领域是“是非之地”，陈景润是“是非之人”，“啊呀，你还是写杨乐、张广厚吧，不要写陈景润了。”^①敢不敢写，怎么

① 徐迟：《报告文学写作漫谈》

写？这就需要勇气和政治敏感。然而，徐迟终于下定决心，闯了这个禁区。他热情赞扬陈景润为人的清白、正直；热情歌颂陈景润不畏艰险的攀登精神，他用诗的语言描绘“陈氏定理”的深邃、奇妙：

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踟蹰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凤鸾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

他恢复了那个“是非之人”和这个“是非之地”的本来面目，在那样的特定政治气候中，此举需要多么大的胆略和勇气！

对于“文化大革命”，作者已意识到它的不合理性，说那是一场“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误，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并且严厉谴责了那种“行动胜于语言，拳头代替舌头”骚动科学院的恶作剧。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如果用今天彻底否定的观点看，当然是很不够的，但是在那样特定的气候中却又不能不说是见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新时期历史转折的伟大序幕。“文革”被彻底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的结果，《哥德巴赫猜想》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向。这种预见性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这种洞察力，政治敏感，与作者的才能有关，但又是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也是指导文章写作的根本理论。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才能正确剖析社会现实及各种历史现象，才能写出反

映事物本质的文章。《人妖之间》对宾县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剖析，就鞭劈入里，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威力。这篇文章揭露了王守信的贪污问题，但它不是为揭露而揭露。作者说：“由于目的不限于揭示王守信事件本身，我的着眼点也就不限于事件的过程，几乎有关宾县的一切，特别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状中的主要之点，我都感兴趣。”^①或者说，作者没有“把王守信案件从宾县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整体上割开来看”，而是把它“还原到那个活的、有血有肉的肌体中去，接通原先的血管经络，通观全体”的。这样，文章就围绕王守信事件，对产生这个“当代英雄”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运用辩证的观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剖析。从而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及其余毒的危险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现存制度的某些不合理性。从某些方面看，《人妖之间》揭示的社会现实，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深度，会使那些平庸的所谓长篇巨著望尘莫及。

《哥德巴赫猜想》和《人妖之间》的成功还启迪我们，写文章必须实事求是，来真格的，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也就是说，讲真话、抒真情是写文章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写文章最起码的道德规范。

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十年动乱中自不必说，在“文革”前乃至跨入历史的新时期，虚假的文章也屡见不鲜。对这类问题进行具体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对端正我们的写作态度，提高写作质量，也是非常必要的。大体说来，产生此类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时代的局限性，作家的盲目性

在“文革”前，这种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那时候，正确路线

① 刘宾雁：《关于〈人妖之间〉》《刘宾雁报告文学选》

占主导地位，极左思潮的干扰是时隐时现。这样，一些作家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而在缺点面前则往往陷入一种盲目状态，把错误当作正确加以歌颂，因而写出了虚夸的文章。茹志鹃的一段写作经历，是有代表性的。她在谈《卫星从东方升起》那篇散文的写作经过时说：“……特别是大跃进浮夸风的时候，我曾经跟上海慰问团到安徽一个地方去验收，亩产一万六千斤。我亲自看见他们从田里割下来，割下来还不算，而且还看见他们打、秤，真的一万六千斤。我当然很激动……我当时写了一篇《卫星从东方升起》，这是浮夸。”为什么是浮夸呢？因为那是把几十亩田里的稻谷移植在一亩中而搞出的恶作剧。她在《〈草原上的小路〉的创作及其他》一文中，从思想上检查这种失误时写道：“……‘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带着一种比较真诚的、天真的、纯洁而简单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我看一切都很美好，都应该歌颂。回顾我当时的歌颂是不是在讲假话？不，我是真诚的，歌颂是从心里出来的……”主观上是真诚的歌颂，但在客观上是歌颂了虚假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盲目性。这种盲目性的产生，是受特定时代的影响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人们，不少作家去掉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讲真话，抒真情，使自己的创作面目一新。茹志鹃就深有感触地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脑子比较复杂了，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也复杂了，看问题不那么简单化了，……今后该歌的我还要歌，不能歌的就要鞭挞……”作家这种思想上的飞跃，必然带来创作上的飞跃，《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等等，都显示了这种飞跃的功力。

（二）赶浪头，随风飘

这是写作责任感不强的表现，是败坏文章声誉的一种极坏的写作态度。

前面讲过，过去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不管是屈服于压力讲违心话，还是讲真诚的假话，都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危害。但文学史上那可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现在，新的时代为作者讲真话，抒真情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可是仍有一些思想路线不端正，写作态度不严肃的作者，继续走赶浪头，随风飘的老路，在文坛上制造笑话。例如正当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时，报刊上却出现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所谓揭露“四人帮”的诗。奇就奇在这首诗原是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揭露所谓“还乡团”的，如今只把诗中的×××改作“四人帮”，又拿来上市。文章不是无情物，诗更注重情感。这样的诗，实在是毫无真情实感，自欺欺人的滥竽充数之作。还有的同志似乎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他们总是东风大随东风，西风大随西风。当“伤痕文学”兴起，他们受到来自“左”的阵风的干扰，完全无视林彪、“四人帮”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巨大破坏，把充满了矛盾斗争的社会现实，看作是“河水荡荡，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一片莺歌燕舞、繁荣兴旺的太平盛世。从这种无冲突论的观点出发，炮制《歌德与缺德》一类的文章，以“歌德派”自居，把那些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伤痕文学”的作者，一律斥之为缺德。当他们受到批评后，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随意编造一些所谓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荒唐可笑的“作品”。这样，便从“歌德派”一跃而为真正的“缺德派”，成为文艺界的笑谈。

上述两种情况，其病在于投机，这是最不正派的写作态度。

还有一种情况是，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引入文艺批评中来。写评论文章，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看人下菜，相互“提携”，对“关系户”作者的作品，唯恐吹之不玄，抬之不高。这样的作风，既败坏了文艺评论的声誉，又有害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这种庸俗作风，实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逆种，是为无产阶级文艺批评职责和使命所不容的。至于那种为了沽名钓誉，偷窃

别人成果的恶劣做法，更是与千古盛事的文章品格背道而驰的。

三、孜孜以求 刻苦磨练

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早已被历史所认可的。但是，时至今日，作者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写作的重要性的认识上，好比射箭只空喊“好箭！好箭”，却不去实际发射是不行的。这就需要身体力行，下定决心，孜孜以求，坚持磨练，韧性战斗，练就一手写文章的本领，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十年寒窗”，“铁砚磨穿”道出了写文章的甘苦。“梅花香自苦寒来”，于今留存的传世之作，都是作者艰苦磨练的成果。

写作的这种艰苦性，是由写作规律所决定的。写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大体要经历如下的过程：生活素材（材料）→题材（论据）→主题（论点）→表达→成品。这个过程说来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周恩来同志深知此中的甘苦，他有一句名言，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里所谓的“得”，是指主题之获得。就是说，一刹那间得到的东西，是建筑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的。积累什么呢？积累生活，积累知识和写作技巧。这种积累，总是和他的成功成正比的。古今中外的大作家，都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唐代韩愈之所以能写出好文章，是与他勤奋治学分不开的。在《进学解》中，他借弟子的口，叙述他勤学苦练的情景时写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散文家。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为了通过反映犯人的生活抨击沙皇的专制制度，便坐上三等车长途跋涉，去流放犯人的远东库页岛旅行，

因而才写出了《第六病室》、《在流放中》。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语言大师赵树理为农民写作，几十年如一日，长期工作、生活在太行农村，因此才能以他的小说为新文学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从积累到获得，需要的时间是难以确估的，有时甚至需要几十年。曹雪芹说他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又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时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这里所说的“当时”，就是指他青少年时期。据此可以断定，《红楼梦》当是调动了作者四十多年的生活积累写成的。梁斌写《红旗谱》亦有类似经历。小说出版于1958年，但其生活的积累，则应从他的学生时代“九·一八”事变算起。1935年他就想着手写《红旗谱》，但因生活不足，技巧也不够，结果只写出一篇反映二师学潮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①《红旗谱》就是在《夜之交流》和后来写的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五幕剧《千里堤》的基础上生发加工而成的。从1931年到1958年，其积累期也长达近三十年之久。长篇创作需要长期积累，短篇需要不需要？回答是肯定的，但相对而言，它的积累期一般要短一些。梁斌的《红旗谱》和《夜之交流》积累期的差距，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红旗谱》用了近三十年，《夜之交流》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写作需要长期积累，各种体裁的作品、文章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刘宾雁写《人妖之间》虽说从调查到定稿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但作为写这篇作品的动因，却是和他二十多年来对现实社会的冷静观察、思考分不开的。看过《哥德巴赫猜想》，就知道陈景润写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从他1953年买到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萌发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动机算起，到1974年把论文交给李书记，也长达二十年之久。

①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